

<https://doi.org/10.52288/jbi.26636204.2020.10.10>

国际收支吸收分析法的国际性比较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Absorption Analysis in Balance of Payments

王语^{1*} 李德兰²
Yu Wang De-Lan Li

摘要

本文选取中、日、德、美四国 1990~2018 年的国民收入及总吸收 29 年的数据资料,运用吸收分析法,在国际收支中对货币贬值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四国的边际吸收倾向皆小于一,大小依序为日、美、德、中,显示四国经常项目符合国际收支吸收论,说明货币贬值作用对日、美两国有限,对中国最为显著,并不是解决所有国家贸易失衡的有效手段;要想从根本上逆转国际收支失衡,应该更多地关注一国经济的基本面。

关键词: 吸收分析法、国际收支平衡、货币贬值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national income and total absorption of 29 years of data from 1990 to 2018 in China, Japa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re selected, and the effect of currency devaluation was empirically analyzed in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using the absorption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rginal propensity of absorption is less than one for all countries and the size is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China in order, showing that the current account of the four countries conforms to the absorption theory of balance of payments. Effect of currency devaluation is limited to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 most significant for China. The results also demonstrate that currency devaluation is not an effective means to solve the trade imbalances of all countries. To fundamentally reverse the imbalance of payment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fundamentals of a country's economy.

Keywords: Absorption Analysis, Balance of Payment, Currency Devaluation

1. 引言

自首个新冠肺炎 (COVID-19) 病例出现以来,疫情已持续多月,并在全球蔓延。疫情爆发对世界经济运行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全球大多数航空公司取消或缩减了 2-6 月往返各国的航班,部分国家甚至采取了暂停进口部分中国商品或暂缓货物清关等措施。疫情导致的人员流动减少以及贸易障碍将产生重要影响,这无疑是对当前全球经济的重大打击,在此特殊情形下,如何实现内外均衡是各国关注的焦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外部需求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其中汇率问题一直是争论的重点。

¹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国际商务学院国际商务专业 wangyu3085@163.com*通讯作者

²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国际商务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

伴随着国际间收支不平衡，贸易摩擦也不断显现，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主要表现为顺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经常项目主要表现为逆差。

吸收分析法（Absorption Approach）指从支出（或吸收）与收入的角度来分析一国的国际收支差额如何出现，以及汇率水平如何决定国际收支差额，并且认为如果一国的实际收入超过对商品和劳务的吸收量，该国就会出现贸易顺差，即意味着总收入大于总吸收。吸收分析法将总吸收分为内部吸收和外部吸收，调节国际收支差额的路径是改变总收入与边际吸收倾向，通过转换政策和吸收政策的相互配合运用，最终达到总收入和总吸收相等，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本文从国际收支的角度出发，依据中、日、德、美四国 1990~2018 年的国民收入、总吸收等 29 年的数据资料，采用吸收分析法对货币贬值效果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吸收分析法对不同国家的适用性。

2. 吸收分析法推导及理论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 30 年代大萧条与金本位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国际收支调节弹性分析法理论，已不能充分适应于战后的经济成长条件。卢花兰等（2008）认为弹性分析理论将国际收支调节建立在局部均衡基础上，只考虑汇率对收支的影响，只分析了汇率变动的初始价格效果，并没有考察价格变动的波及效果。

吸收分析法又称支出分析法，由 1952 年詹姆士·爱得华·米德（James Edward Meade）和当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西德尼·亚历山大（Sidney Stuart Alexander）提出，将国际收支与宏观经济环境连接起来，比较清晰地提出了弹性分析理论未提及的前提条件。吸收分析法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和总需求的角度，系统研究货币贬值政策效应并进行宏观均衡分析。它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方程式入手，着重考察总收入与总支出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际收支调节的相应政策主张。陈思与黄强（2005）认为吸收分析法提出了弹性论未提及的国际收支理论逆差的货币方面，为货币分析法奠定了基础；谢赤（1998）提出吸收法分析法的国际收支调节属于政策调节，主张运用宏观需求管理政策。60 年代后期，资本主义经济逐渐陷入滞胀的局面，在此背景下王军（1992）认为吸收分析法已逊色于货币分析法，货币分析法则从货币供求关系，反应货币贬值对国际收支产生影响。

吸收分析法有以下几个基本假设前提：一是国民收入与支出的变化决定一国的国际收支；二是忽视资本项目，认定贬值是出口增加的唯一原因；三是将贸易收支与国际收支等同；四是假设生产要素的转移机制运行完全平滑（焦冰欣与李家山 2015）。程惠芳（1996）认为国际收支吸收论和货币论实际上是以牺牲国内经济增长率换取国际收支平衡；杨一平（1992）认为弹性分析法、吸收分析法以及货币分析法在论述贬值问题上均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其基本观点对我们如何指导人民币贬值具有一定启示，合理应用国际收支理论，扬长避短才能真正起到改善国际收支的作用。

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模型中，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民收入核算如下：

$$Y = C + I + G + (X - M) \quad (1)$$

移动等式两边可得：

$$X - M = Y - C - I - G \quad (2)$$

令国内吸收为： $A = C + I + G$ ，贸易差额为： $B = X - M$ ，代入（2）式中则有

$$B = Y - A \quad (3)$$

由此可见，国民收入与总吸收的大小关系决定着国际收支是否平衡，而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经济中各变量的不平衡，国民收入和国内吸收大小对比越显著，国际收支差额越大。对失衡情况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开源，即增加 Y ，解决充分就业问题，或者充分利用闲置资源；第二种是节流，即减少 A 。进一步将总吸收写成国民收入的函数，可表达如下：

$$A = A_0 + \alpha Y \quad (4)$$

其中 A_0 为独立于收入之外的自主吸收，即无论存在多少国民收入都必定存在的国内吸收； α 为边际吸收倾向，即每增加 1 单位国民收入所带来的吸收量。将 (4) 代入到 (3) 中整理可得：

$$B = (1 - \alpha)Y - A \quad (5)$$

由 (5) 可知，国际收支差额具体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总收入的高低、边际吸收倾向的大小和自主吸收的高低，其中边际吸收倾向的取值是关键。

根据上述理论公式，吸收论所主张的国际收支调节政策，就是支出转换政策和支出增减政策的相互配合运用。在非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当国际收支逆差时，表明一国的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即总吸收超过总收入，这时就应当运用紧缩性的财政或货币政策，来减少对贸易商品（进口）的过度需求，以纠正国际收支逆差；但紧缩性的财政或货币政策在减少进口需求的同时，也会减少对非贸易商品的需求和降低总收入，因此，还必须运用支出转换政策来消除紧缩性财政或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使进口需求减少的同时收入能增加，这样使贸易商品的供求相等，非贸易商品的供求也相等，需求减少的同时收入增加；就整个经济而言，总吸收等于总收入，从而达到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

吸收分析法的经济效应主要表现为货币贬值效应。货币贬值效应可分为贬值对收入的直接效应、贬值对吸收的直接效应及贬值对吸收的间接效应。其中贬值对收入的直接效应即贬值能否改善贸易收支，可分为以下三点：

2.1 闲置资源效应

吸收分析法着重从宏观经济角度整体的考察国际收支，马之驊（1990）在其研究中提出贬值可以改善国际收支，但必须有闲置资源的存在；雷艳丽（2010）也认为吸收论重视从宏观角度来分析贬值对国际收支理论的影响，因此贬值要改善国际收支必须要有闲置资源，即有存在闲置资源才能够实现贬值后扩大生产，增加出口。因此，如果一国国内资源处于未充分利用条件下，货币贬值一般来说货币贬值会促进该国出口的增加与进口的减少，从而使国民收入增加；但与此同时，国民收入的增加会使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增加，又会增加国内总吸收，从而使国际收支出现恶化。最终货币贬值能否改善国际收支取决于边际吸收倾向 α 的大小：若 $\alpha > 1$ ，吸收的增加额会大于国民收入的增加额，导致国际收支出现恶化；若 $\alpha < 1$ ，则吸收的增加额小于国民收入的增加，促使国际收支得到改善。

2.2 贸易条件效应

当马歇尔-勒纳条件 (The Marshall-Lerner Condition) 满足时, 本国货币贬值会改善贸易收支, 本国货币升值会恶化贸易收支。但是, 在现实中当一国进货币贬值后, 贸易收支并没有得到迅速改善, 甚至在贬值后的一段时期, 贸易收支出现恶化出现一定的时滞, 这就是贸易条件效应, 即 *J* 曲线效应 (韩斌与刘园, 2013)。

对 *J* 曲线形成原因与过程的各种解释中, 最有影响的是经济学家 Magee (1973) 的研究, 他将货币贬值效应分成三个阶段来分析: 货币合同阶段、汇率传递阶段和数量调整阶段, 在不同阶段影响贸易收支的因素是不同的。

在货币合同阶段, 贸易活动执行本币贬值前已签约的合同, 进出口商品的数量和价格未发生变化, 货币贬值改变了原有合同的相对价值, 从而对贸易收支产生影响, 其影响程度取决于签订合同中所约定的标价货币; 在汇率传递阶段, 进出口价格根据汇率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 但短期内贸易数量由于进出口供求粘性, 对新价格反应缓慢, 保持相对稳定。此时, 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取决于价格调整情况和进出口供求的相对无弹性情况; 在数量调整阶段, 短期进出口供求无弹性情形已经消失, 进出口数量将根据价格变化进行调整, 进出口弹性直接影响此阶段的贸易收支。假设货币贬值国进出口弹性无穷大, 则贸易收支能否改善取决于马歇尔-勒纳条件是否成立。

2.2 资源配置效应

吸收分析理论认为, 虽然贬值会恶化贸易条件, 但由于贬值影响资源配置, 在贬值过程中, 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 生产率的提高抵消了贸易条件的恶化, 结果是提高了实际收入。特别是在汇率高估和外贸管制下, 微观经济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下, 贬值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会更明显。

在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 工资实际增长率也越高, 实际汇率的上升也越快的现象。当贸易产品部门 (制造业) 生产效率迅速提高时, 该部门的工资增长率也会提高。国内无论哪个产业, 工资水平都有平均化的趋势, 所以尽管非贸易部门 (服务业) 生产效率提高并不大, 但是其他行业工资也会以大致相同的比例上涨, 这会引起非贸易产品对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 这即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Balassa-Samuelson Effect)。实际汇率的变动会影响国家间商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 使商品和要素在国家及各部门间重新进行配置, 从而对一国居民的福利和经济长期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吕风勇与王建光, 2006)。通过探讨不同因素变化导致的实际汇率变动所具有的各种资源配置效应, 可以为一国货币当局合理调节汇率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3. 吸收分析法的实证分析与检验

研究一国货币贬值能否改善国际收支, 必须先了解该国总吸收与国民收入的具体数据。本文选取了中、日、德、美四国 1990~2018 年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分析, 其中以国内生产毛额 GDP 作为解释变量, 以总吸收 (A) 作为被解释变量, 为最终消费 (C+G) 与存货变动 (I) 的加总, 数据取自联合国数据库 (UNdata), 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

由回归结果可知国民收入和总吸收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具体而言, 国民收入每变动 1 单位 (万亿美元), 引起中、日、德、美四国总吸收变动分别为 0.5337、0.9352、0.7021、0.8489 个单位, 且 R^2 均接近于 1, 表明模型对样本数据拟合优度较高, 二者相关性较强; 针对斜率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t* 检验) 表明国民生产总值对总吸收的确有显著性影响。就图 1 的散点图来看, 中、日、德、美四国国民收入与总吸收之间存在强

烈线性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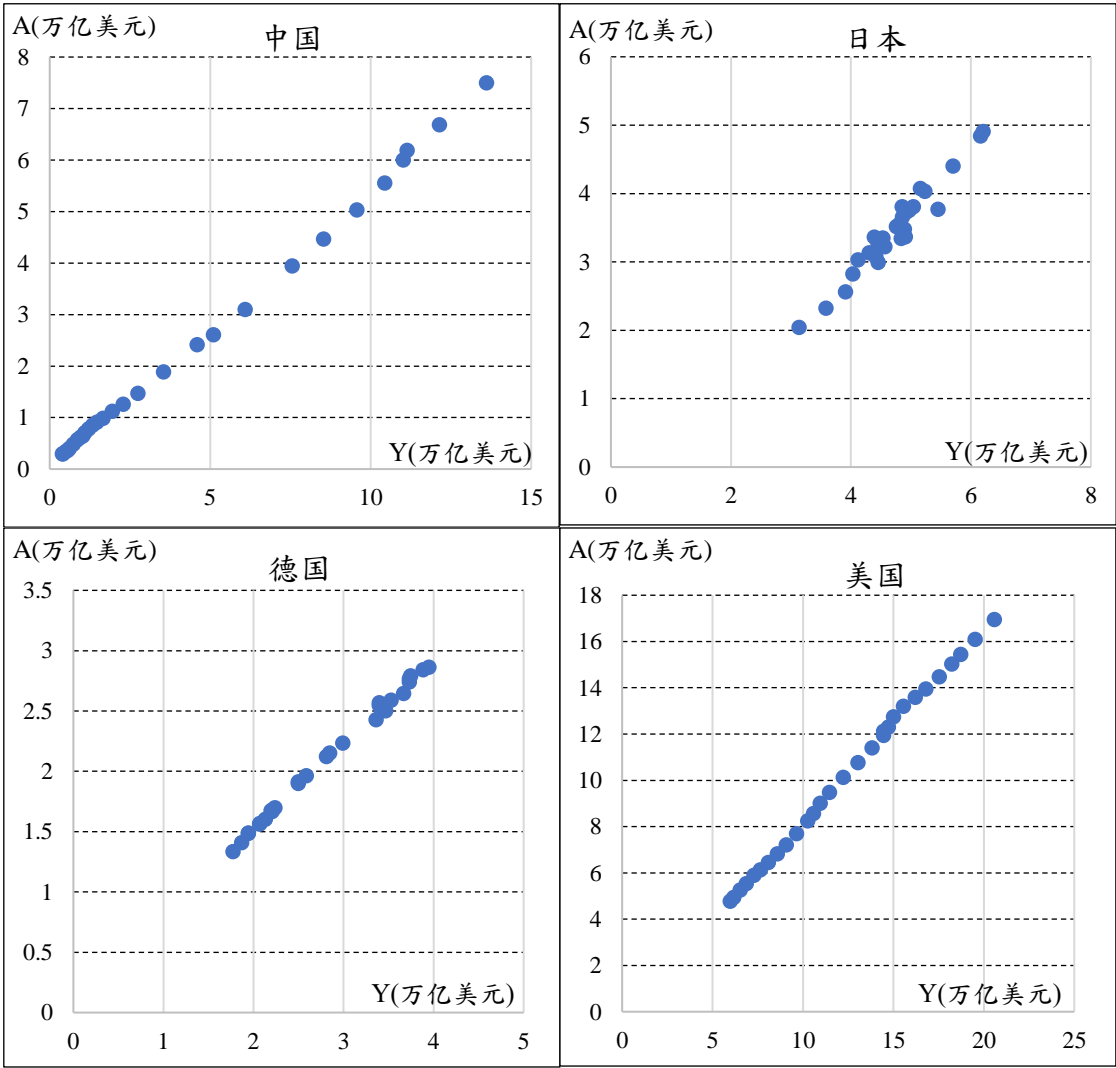
表 1. 中、日、德、美四国 1990~2018 年的国民收入与总吸收回归结果

	中国	日本	德国	美国
A_0	0.0585 (2.1733)*	-0.9542 (-4.7992)**	0.1232 (5.3882)**	-0.3164 (-4.0284)**
α	0.5337 (118.4615)**	0.9352 (22.4545)**	0.7021 (89.6776)**	0.8489 (141.9593)**
R^2	0.9981	0.9492	0.9967	0.9987
\bar{R}	0.9980	0.9473	0.9965	0.9986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 t 检验显著水平在 95%以上

** t 检验显著水平在 95%以上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图 1. 中、日、德、美四国国民收入与总吸收散点图

参考吸收分析法的理论来看,一方面从货币贬值对于收入的闲置资源效应角度,货币贬值能否改善国际收支,取决于边际吸收倾向的大小,若 $\alpha > 1$ 则吸收的增加额会大于国民收入的增加额导致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反之亦然。

例如中国虽是大国,但仍位列发展中国家,国际资本流动程度不高且存在非充分就业,闲置资源储备量更大,因此人民币升值一方面使国内商品供给增加,另一方面又通过降低外汇储备减少货币供给,改善国际收支效果显著;但就日本而言,因其闲置资源有限,且进出口货物中高弹性的制成品比重最大,受进出口影响较大。与美国不同,日本的经常项目为顺差,海外投资规模大,同时由于日本的金融结构主要是银行主导型,企业间融资是以银行等金融中介的间接融资为主,奉行低利率政策,在今天的全球化环境下,因此日本吸引外资的能力较弱,货币贬值对日本效果微弱,这也与日本边际吸收倾向高达0.9542相符。

另一方面,从贸易条件效应角度,若 $\alpha > 1$,则贬值的贸易条件会使国际收支状况得到恶化,反之亦然。例如德国经济发达,以第二产业为主,依靠货物贸易拉动主体经济,这主要主要归功于德国国内物价相对稳定,劳动生产率一直在稳步提高。但德国同时受服务贸易与对外转移长期逆差的影响,货币贬值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国际收支,但对贸易产生的影响也会反作用在国际收支上(刘斌,2007);但由于德国边际吸收为0.7021,影响不足以恶化国际收支,因此货币贬值对德国国际收支仍有显著改善作用。

金融危机后的美国货物贸易持续逆差,而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表现持续顺差,美国一直力图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美元不断贬值,希望借此举改善美国经常项目的贸易状况(刘姝,2016)。虽然美国已经成为最大的负债国,拥有巨额的对外负债,但是投资收益净额却始终为正。美国证券投资长期保持净流入,是主要的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来源,因此货币贬值对美国改善国际收支意义不大,应当从调整产业结构入手。

4. 结语

本研究结果表明,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难以单靠一种措施解决。由于出口扩大会引起国民收入和国内吸收同时增加,只有当边际吸收倾向小于1,即吸收的增长小于收入的增长,贬值才能最终改善国际收支。通过比较中、日、德、美四国国际收支现状明显得出,边际吸收越接近于1,单一的货币贬值改善国际收支效果越差,各国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当注意从国家宏观角度出发,协调好总吸收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从而改善当前的国际收支失衡的状况。

目前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均采用“外向型”经济追赶模式,通过非对称的政策安排,优先开放和发展对外部门,利用本国的相对优势(如高效的产出、优良的品质、廉价的资源或非竞争的市场)逐步进入国外市场或吸引外部资金;因此随着对外部门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内外部门发展的差距日趋扩大,国际收支差额逐年加大。姚文萱与李传文(2020)提出若一国产业过度依赖本币贬值来增加外汇收入,那么该国的社会资源无法得到优化,经济结构不能实现良好的调整;且一国频繁通过官方降低汇率来改善国际收支,提高国民收入,则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肖东华与朱翔龙(2014)也认为汇率改动联系着全球经济,成功的汇率政策对未来宏观经济稳定、贸易平衡、经济增长等都有深远、积极影响。

发展中国家主要表现在资本与金融账户大多为逆差,资本大量外流,处于国际贸易的弱势地位(刘婉思,2019)。张坦与王晓畅(2004)认为国际收支汇率调节的政策理论对于汇率政策使用及其政策搭配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各国;因此,单纯依靠汇率

调整来试图缓解国际收支失衡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摆脱粗放式的增长模式才是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只有这样才可以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最终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 卢花兰、曾庆黎、张杰(2008)。国际收支弹性分析法的背景和缺陷。华商,15,146。
2. 陈思、黄强(2013)。国际收支理论文献综述。商,8,148+147。
3. 谢赤(1991)。国际收支调节的数理经济分析—系统工程在国际经济中的应用。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全国青年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论文集(第1卷)。中国系统工程学会,797-802。
4. 王军(2008)。国际收支理论的发展轨迹及比较研究。世界经济研究,1,66-71。
5. 焦冰欣、李家山(2015)。国际收支吸收分析法的适用性实证分析。经济研究导刊,1,246-248。
6. 程惠芳(1996)。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与政策的演变。经济学动态,8,49-53。
7. 杨一平(1992)。货币贬值对纠正国际收支逆差的理论比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92-95。
8. 马之騷(1990)。当代国际金融问题讲座—第八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性与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文汇,6,67-71+66。
9. 雷艳丽(2010)。浅谈国际收支调节的吸收理论。经营管理者,1,203。
10. 韩斌、刘园(2013)。人民币的J曲线效应—基于中国主要双边贸易市场的实证研究。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3,34-43。
11. 吕风勇、王建光(2006)。实际汇率变动的资源配置效应。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8(3),59-63。
12. 刘斌(2007)。德国国际收支的发展与调节。中国货币市场,2,34-39。
13. 刘姝(2016)。中美国际收支结构分析。现代营销(下旬刊),1,4-5。
14. 姚文萱、李传文(2020)。汇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分析。中国市场,9,52-53。
15. 肖东华、朱翔龙(2014)。吸收分析法模型—浮动利率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经济体制改革,1,144-147。
16. 刘婉思(2019)。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广西质量监督导报,12,136。
17. 张坦、王晓畅(2004)。国际收支的汇率调节理论及其现实意义分析。理论界,5,245-246。
18. Magee, S. P. (1973).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production, and trade: A survey.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5(1), 1-43.

收稿日期: 2020-05-03

责任编辑、校对: 沐园琳、吴鹭瑶